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与  
中国外交决策

牛军著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冷战与  
中国外交决策

牛军著

SIFIS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 牛军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2. 10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

ISBN 978-7-5108-1709-0

I. ①冷… II. ①牛… III. ①冷战—国际关系史—文集 IV. ①D8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15号

冷战与中国外交决策

---

作 者 牛 军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9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709-0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出版说明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追寻当下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是历史研究者的使命之一。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不仅主导了战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对当前一系列国际纠纷和冲突还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学界掀起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潮，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此同时，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也在兴起。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涌现，国际和国内高层次学术会议接连举办，从而使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成为国际冷战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镇。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我们请中国冷战国际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主编了这套《冷战国际史研究文库》丛书。丛书邀请该领域海内外优秀的华人学者，把自己多年来的代表性论文，编选成册，以期从各个方面反映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果。

九州出版社

## 代序：冷战国际史研究：世界与中国\*

沈志华

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人们惊异地发现，国际史学界有一项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学术成果之多、之新，学术活动之广泛、之频繁，令其他研究领域望尘莫及，以至人们不得不考虑赋予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这就是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 1991 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同时创办了专业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sup>①</sup> 所谓“国际史”，其含义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之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战结束后二十年来，在参与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确为历史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因此，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前主编徐思彦提出的看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sup>②</sup>——毫不为过。在笔者看来，可以进一步指出，冷战国际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

冷战国际史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前沿性、跨学

---

\* 本文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为 2010 年 10 月 16—17 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年会论文。

① 人们也曾使用过“新冷战史”这一概念。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盖迪斯把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重新考察和评估冷战历史的现象称为“The New Cold War History”，见 John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82.

② 徐思彦：《冷战史研究：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中华读书报》，2004 年 11 月 10 日。

科学研究领域，当前在世界主要国家已成为发挥重要影响的学术潮流，并受到很多国家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本文打算从学术特征、热点问题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谈谈冷战国际史的研究状况及其在中国的表现。<sup>①</sup>

## 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

把冷战国际史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是因为在学者队伍、研究方法、活动方式等方面，它确有一些引起人们注意的学术特征。这些具有全球化时代学术代表性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以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的国际学者队伍

与其他学科不同，冷战史研究者们没有组建一个世界性、地区性或全国性的研究会，而是建立起一个个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这些机构和群体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学校为依托，或者以不断设立的研究项目为基础，但无论是常设机构，还是临时组合，他们都异常活跃，并经常按照不同的课题相互结合，交换文献资料，沟通研究信息，召开各种研讨会、书评会、讲演会等。各中心（研究组）几乎都设立了自己的英文网站，用以发布档案文献、研究信息、学术论文等。网络和会议是世界各地冷战史研究者沟通和联系的主要渠道。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下设的冷战国际史项目，是美国也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项目通过出版刊物和组织各种国际会议，大量收集、整理、翻译并公布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还接受各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为他们提供收集资料、开阔视野、参与讨论的机会。目前，该项目的工作重心已经从莫斯科转向北京，并已同中国外交部签订几个有关公布或出版中国档案的协议。

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

---

<sup>①</sup> 主要参考资料：Odd Westad (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0; Wilfried Loth, "General Views on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 3, No. 2, January 2003, pp.157-165; 沈志华：《冷战史新研究与档案文献的收集和利用》，《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140—150页；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22页；Зубок В.М., Печатнов В.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итог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3, № 4, 5; 翟强：《西方冷战史研究近况》，2008年4月29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演讲；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в ИВИ РАН "Феномен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XX века: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 6, с.73-100.

个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档案馆致力解密美国政府涉及安全问题的档案，同时也收藏了大批俄国、东欧、拉美及其他地区的档案，其中很多文件已经电子化，供研究人员免费订阅下载。此外，档案馆还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档案馆就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序问题提供咨询，并成为这些文件的收藏中心。自2001年以来，该档案馆定期在俄国举办冷战史研究暑期培训班，每年设立不同的专题。

伦敦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是英国最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该中心重点进行冷战在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学术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国学者关于冷战史研究新解释和新研究的论文，还编辑冷战研究系列丛书。中心创造跨学科的研究条件，研究人员有机会与国际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其他世界范围的机构就教学和研究问题合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该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项目。

以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欧洲最著名的冷战史研究中心，主要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战，其联系和活动范围甚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冷战研究中心则重点研究欧洲的冷战及意大利对外关系。

在美国还有许多以大学为依托设立的冷战史研究中心，这些中心都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战史课程，并举办公共讲座和研讨会、接受访问学者等。俄国历史学家一开始就十分关注冷战史研究，1995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冷战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以及俄罗斯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关系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还有一些大学，都有学者参与其中。中东欧各国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其中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它们分别设在匈牙利科学院1956年匈牙利革命历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亚军事史协会之下，研究内容集中在冷战时期有关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问题上。在亚洲，日本的冷战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请研究项目为基础建立的，比较活跃的有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这两个中心通过在日本文部省申请研究项目的方式，重点从事东亚冷战史研究。韩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冷战史研究机构，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他们经常以朝鲜战争研究为题，与各国学者进行讨论。庆南大学极东研究所、北韩大学院大学也有一批较为固定的学者参与国际学界有关朝鲜半岛统一和危机等问题的研讨。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

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召开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战史研究小组，经常举办读书会。此外，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了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在国际学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本身在冷战格局演变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决策两次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在于中国学界的不懈努力。早在 80 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就参与了国际舞台上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讨论。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档案文献的不断披露，各级档案馆的陆续开放，中国学者的研究愈来愈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其中，重要的突破就在 1996 年 1 月美国 CWIHP 在香港召开“冷战在亚洲”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学者不仅提交了多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而且就国际学界当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关于出兵朝鲜的电报的真伪问题，回答了俄国学者的质疑，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赞同和好评。<sup>①</sup> 以后不久，凡是涉及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冷战史国际会议，都会有许多中国学者受到邀请。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被大量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他们的看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2004 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评估中央情报局（1948—1976 年）对华情报工作时，专门聘请了 4 位中国冷战史学者出席会议，与中情局官员展开了颇具特色的对话。

客观地讲，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队伍一开始是学者自身在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笔者那时刚刚从商界返回学术界，感到有两个新事物值得重视：一是俄国档案大规模的解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无限机会；一是冷战史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领域、思路和方式。于是，笔者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方面积极组织收集、整理俄国档案，一方面开始有意识地集合对冷战史研究感兴趣的学者。我们差不多每年自费组织一次国内学者的讨论会，不分地区，不论单位，不要会务费，只要论文水平高，使用了新的档案文献，谁都可以参加。每次会议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参加。几年下来，这支研究队伍便自然形成了。当时的客观条件是，第一，国家对学术研究的投入较少，能够用于基础学科研究的资金更是短缺；第二，从传统的观点看，冷战史是否可以作为一门学问还受到质疑，甚至“冷战”一词的出现都令人敏感。所

<sup>①</sup> 该文后来在美国发表，见 Shen zhihua,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 A Chinese Scholar’s Reply”,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pp.237–242.



以，没有民间自发的渠道，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很难起步。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情况大大改观。华东师范大学在陈兼教授的倡议下，在国内首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几年后，学校领导投入大量资金，中心不断引进人才，连续开发项目，招收研究生，开设专业课，还办起了专业杂志和网站，从国外购买了大量档案文献，并加强了国内学者之间以及同国外学者的交流。这时，“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2009 年夏，各校冷战史研究者在张家界会议上提出：共建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论坛，共同加强杂志和网站的建设。相信这支队伍将继续活跃在冷战史国际学界的前沿。

## 2. 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或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论”，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要说档案开放最规范、档案收集最便利、档案利用最有效的，还是美国。目前，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已经相继解密了冷战时期从杜鲁门到福特各位总统的档案。弗杰尼亚大学米勒中心的总统录音项目则收集了从罗斯福到尼克松六位总统大约 5000 小时的会议录音和电话录音，其中很多已用文字公布，可以从网站下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还收藏有美国政府前官员的个人档案和访谈记录。特别是乔治城大学设有一个外交口述史项目，收藏有美国许多外交官的访谈录和口述史的录音和文字记录。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发展署的档案馆也有很多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会信息服务公司和美国大学出版社将大批档案制成缩微胶卷，其中包括国务院、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由莱斯公司（LexisNexis）负责全球统一销售。<sup>①</sup>此外，上述各冷战研究机构的网站，以及一些专业网站——如斯塔·克劳拉大学的冷战电子信息资源网，也

<sup>①</sup> 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已购买近 2000 卷缩微胶卷，目前正在整理目录，并将在网站公布。

大都发布各种档案文献。特别是国家安全档案馆为督促政府解密档案所做出的努力，深得各国学者的好评，有关中美缓和的基辛格文件、尼克松文件，就是在他们的催促下得以及时解密的。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蒋介石日记，也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至于学者最常使用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系列文献以及新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解密文件，目前已经陆续上网，研究者可以自由下载。

英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解密，外交部编辑出版了《英国海外政策文件集》（DBPO: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现已出版第一系列 8 卷（1945—1950）；第二系列 4 卷（1950—1960）；第三系列 5 卷（1960—）。在意大利，备受关注的是保存在葛兰西学院的意大利共产党的档案。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曾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并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sup>①</sup> 不过，到 90 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sup>②</sup> 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国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俄国档案的收集和使用主要依靠三个来源。

第一，俄国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披露者的主观色彩，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第二，在俄国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引起冷战史研究者注意的内容有：1945—1954 年苏联的核计划，共产党情报局历次会议记录，苏共二十大与非斯大林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的“宫廷政变”，至 1960 年前克格勃的工作，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活动，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书刊和新闻检查制度，1956 年匈牙利危机，中近东的冲突，还有苏联与美国、德国、奥地利、芬兰、以色列及东欧、非洲的关系等

<sup>①</sup> 关于俄国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 Mark Kramer, “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 Progress and Pitfalls”, *CWHP Bulletin*, Issue 3, Fall 1993, pp.18-39; 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 年第 5 期,第 136—149 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 140 期(2000 年),第 200—217 页。

<sup>②</sup> 参见 Чубарьян А.О.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6, с.3-22。

等。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至于中苏关系，已经出版的三部文件集则公布了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这些文件集对于冷战史专题研究十分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编者的选择未必全面，有些关键性档案还要研究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取。

第三，俄国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国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国家安全档案馆。此外，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大量俄国档案。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献虽然显得分散零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

在俄国档案馆收缩的同时，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馆开始陆续对外开放。笔者最近去东欧和中欧七国访问，参观了二十多个档案馆。那里的国家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在几年前已全面开放，特别是前共产党的档案，没有解密期限限制。这种状况，对于研究者了解冷战时期铁幕另一边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东欧各国与苏联关系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俄国和中国档案管理政策紧缩的不足。目前在冷战国际史研究较多利用的有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档案，以及德国档案馆收藏的东德档案。一些国家的冷战史研究机构也收藏和整理了大量专题档案，如匈牙利中欧大学社会档案馆收藏的自由欧洲电台档案，匈牙利冷战研究中心所从事的项目：1945—1991年苏联集团活动年表、1988—1991年共产主义瓦解与冷战结束、匈牙利与东西方关系等。还有很多研究机构与冷战国际史项目或平行历史项目（PHP）合作，在这两个中心的网站或杂志上经过公布他们整理的各国档案，其内容涉及共产党情报局、华沙条约组织、苏南关系、阿南关系、中朝关系，以及罗马尼亚与华约关系、罗马尼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南斯拉夫与冷战、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事件的专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东欧各国档案的开放将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意义不亚于90年代俄国档案的解密。这一点，非常值得引起注意。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策划收集、整理和翻译东欧档案的项目。

在亚洲，经过若干年的整顿，目前台湾的档案开放最为规范，使用也十分便利。应广大学者要求，内容丰富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几年前已从台北郊区的

北投外交部档案馆移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数位化整理，至1975年以前的所有档案均制成可供下载的PDF格式，使用者也可以上网查询目录。此外，“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目录中也有大量涉及冷战历史的档案，为了方便使用者，“国史馆”今年已在台北市内开设阅览室。香港大学的主图书馆则是亚洲地区收藏美国、英国档案（缩微胶卷和缩微胶片）最多的地方。

根据《国家公文公开法》，自1976年以来，日本政府分21批陆续解密了外务省所藏战后的档案。目前档案的解密时间已到1972年，从解密的卷宗主题看，首先是有关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美关系的文件，其次如日本对东南亚各国政策、对中国海峡两岸政策、对朝鲜半岛政策，以及日本与阿拉伯世界各国、拉丁美洲各国和欧洲各国关系的档案，都已基本解密。<sup>①</sup>此外，日本学者还注重整理和出版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对日政策档案。

韩国的国家档案馆也是对外开放的，但很少看到韩国学者直接引用韩国档案，据说是因为卷宗管理混乱，不易查找，外交通商部也没有专门的档案馆。不过，韩国学者也做出了很大努力。有关朝鲜战争及此前的档案，韩国本身的文件大部毁于战火，但学者们注意收集和编辑了主要参战国的档案。如美国文件：原主文化社1993年编辑、出版的《1945—1948年驻韩美军军政厅官报》、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1995年编辑、出版的《美军政期情报资料集（1945—1949年）》等。中国文件：将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基层部队的文件、命令、战士家书等编辑、影印成册，成为一套很有价值的文献集。俄国档案：把在朝鲜的苏联军事顾问团的900余件档案影印出版，其中主要是顾问团关于朝鲜领导人的背景、朝鲜政治经济状况、朝鲜人民军的情况以及战争各阶段进程给莫斯科的报告。此外，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还在整理有关战俘问题的历史文献。

以威尔逊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为主要牵头人，通过到当事国举办或邀请当事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正在一致努力，敦促越南、蒙古、古巴、印度和朝鲜政府打开他们那里档案馆的大门。特别是2009年5月在新加坡召集的亚太地区各国档案馆负责人的会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档案馆均表示了积极态度。显而易见，这些国家档案的解密，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sup>①</sup> 有关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的卷宗目录及各批解密档案的数量，可以在日本外务省网站浏览。其网址是：<http://www.mofa.go.jp/>。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也公布了档案法，解密年限为30年。但是迄今为止，档案制度及其管理方式几乎还停留在原地，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且不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与近年来的俄国相比，中国大陆的档案管理、开放和利用，也存在着一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其一，开放程度极其有限，特别是中央一级和各国务院主管部门的档案，根本就没有对社会开放。据说在1998年档案法修订和公布以后，有关机构还下达了“十不准看”的内部规定，照此排列下来，可以对公众开放的有研究价值的档案就所剩无几了。甚至南京的第二档案馆，尽管都是民国时期的文件，一般学者也很难看到。省级档案虽然好一些，但也有类似现象，而且很具中国特色——人际关系超于法律规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主管部委都是决策机构，那里的档案不开放，对冷战时期中国的决策过程当然是无从了解的。不过，也有例外，外交部的档案已于2004年对社会公开，到目前为止已经分三批解密了1949—1965年的档案。不仅一般中国公民，甚至国外学者亦可前往查阅。

其二，中国的高层档案文献主要是经专门机关挑选和编辑后出版的，其优缺点如上所述，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机构的研究者得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直接使用中央一级的档案文献进行研究，一般学者只能从他们的研究著作中间接引用一些重要史料。且不说这种状况对广大学者来讲是十分不公平的，而且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直接引用者由于疏忽或受其观点和水平的限制，片面以至错误地使用了档案文献，就会以讹传讹，影响其他学者的研究思路。

其三，中国没有专门的档案解密机构，也没有规范的和科学的解密程序，某一文件是否可以开放和利用，往往是主管人说了算，于是便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同样一件档案，在这个档案馆可以看，在另一个档案馆就不能看；甚至在同一个人档案馆，这个馆长批准查阅，另一个馆长却予以拒绝。更为可怜的是，中国许多档案是否可以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竟取决于一个档案保管者的知识和政策水平。

中国限制档案开放的做法，最终受害的是中国自己。同一个事件，你不解密，人家解密，结果是研究者只能利用国外档案进行研究，不仅话语权旁落，也往往难以全面掌握历史真相。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中国有关档案管理和利用的法律制度不健全、不严谨，一方面在于档案管理者观念需要根本转变：档案文献属于国家还是属于社会？查阅和使用历史档案是不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力？档案管理者对档案文献的责任，是重在保管收藏，还是重在为社会提供和利用？虽然这两方面的

改进，在中国均非普通学者力所能及，但是作为档案的使用者，中国的冷战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只是被动地、消极地等待。在期待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开放，期待中国档案制度提高其公正性、公平性和法律化水平的同时，学者也必须而且应该努力有所作为。充分利用地方档案进行个案研究，就是一个突破口。面对 21 世纪学术研究发展的国际化和公开性前景，中国学者只有在收集和利用档案文献方面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说，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也是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的。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都已经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如果这些单位联合起来，对于中国学者利用档案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各国档案的解密和利用推动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冷战史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各国档案的解密，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运动。综合利用各国档案文献研究一个专题，的确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自不待言，研究双边关系要利用双边档案，而各国档案的解密则为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资料来源。如研究中苏关系时人们发现，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特殊关系，在后者的档案馆里收藏着许多涉及中苏分裂时期苏共与东欧各党的往来函电，而这些材料无疑是判断苏联立场和态度转变的重要依据。同样，俄国外交部档案馆中保存的苏联驻朝使馆的大量电报和报告，也是研究中朝关系不可或缺的史料。至于研究冷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危机，就更离不开对多边档案的利用了。以朝鲜战争为例，在目前冷战历史的所有重大事件中，关于这个专题所发表和披露的各国档案数量最多，范围最广。惟其如此，朝鲜战争研究才在前几年形成了高潮，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其他像研究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印度支那战争、匈牙利事件、台海危机、柏林墙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核武器问题等等，亦无不如此。总之，对于读冷战国际史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没有档案文献的题目是不会去做的，做了也不会通过。

### 3. 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重建历史事实

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是因为形成了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

构建历史事实。

在过去的冷战史研究中存在不同学派（如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等），其区别主要是观点不同，而对基本史实的认定则没有根本的分歧。冷战结束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即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缺失，过去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往往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被歪曲的。现在，双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了，在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对立也淡漠了，人们才发现，原来冷战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以往理解的那样。例如，过去研究者以为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 1950 年 1—2 月曾在莫斯科秘密会面，从而产生了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共谋论”解释。现在我们知道了，金日成 4 月 10 日到达莫斯科，而毛泽东在 2 月 17 日已经离开了那里。没有这种对史实的重新认定，研究者就无法了解朝鲜战争爆发的复杂过程和真正原因。还有，过去人们都认为，在波兰十月危机初期，是毛泽东的反对立场迫使赫鲁晓夫做出了从华沙周围撤兵的决定。现在我们知道了，在 10 月 19 日和 20 日苏共中央决定放弃在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在华沙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新的史实认定并不否定中国后来在促成苏波关系缓和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却很可能导致对中、苏、波三角关系的简单化理解。类似的案例在新冷战史研究中比比皆是，整个冷战历史的过程正在重建，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然，在史实认定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解释，也不排除会发生分歧，甚至激烈的争论，但其总体目标是澄清史实，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也是对历史过程做出正确的和准确的判断，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观点方面的辩论，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派。由于新的档案文献大量地、成系统地涌现，冷战史研究不得着力于重构历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档案正在不断地、陆续地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根据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学术准则，在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家不可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因此，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等待和努力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会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理论的升华。

#### 4. 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中盛行的国际合作

冷战国际史研究国际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广泛的国际合作。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内涵决定的。

冷战史学者的国际合作首先表现在档案文献的收集、利用和交流方面。凡是参加冷战国际史的学术会议，各国学者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谁带来了什么新的档案，会议组织者也经常要求各国学者带来相关的档案或信息。休会和茶歇时，会场内外见到的都是学者们在交流档案资料。这种景象在冷战史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均可见到。有些会议的主旨就在于介绍和推荐最新解密的档案，如2006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亚洲冷战”，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刚刚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在国际学界亮相。还有的会议则是专门为了促进某一国家的档案开放，如2000年1月在河内、2003年在乌兰巴托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以及2009年6月在威尔逊中心召开的国际会议“印度与冷战”，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了上述活动，并广泛邀请国外学者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讨论。一般说来，冷战史的学术讨论会只要稍具规模，就一定是国际会议。

冷战国际史可以纳入国际关系史的范畴，但它又不仅仅是研究国际间双边或多边关系，而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外交、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中苏同盟破裂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大改组及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美关系缓和造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及其对多重双边关系的影响，还有马歇尔计划、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匈事件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在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几乎都无法单独由一个国家召开，这是导致冷战史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频频召开、冷战史学者在国际舞台异常活跃的主要原因。此外，冷战史研究中档案利用的多国性和综合性，也要求相关专题的各国学者必须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从形式上看，这种国际合作除了经常或定期召开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外，还有档案利用培训班、双边博士论坛、跨国口述访谈等，如威尔逊中心与乔治·华盛顿大学每年夏季组织的档案培训班，华东师大和乔治·华盛顿大学连续举办的两次冷战史中美博士论坛，都极受各国学生欢迎。在某些专题研究方面，甚至出现了不同国家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项目，如威尔逊中心组织的北朝鲜国际文献开发项目（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华东师大最近设计的关于社会主义同盟理论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较研究的项目，都邀请了多国学者参与，组织了国际团队。此外，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正在与威尔逊中心商谈，准备明年在华盛顿设立驻美国的常设联络机构。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学术特征，那就是从史料收集、研究方法到成果形式等各方面都体现出来的国际化现象。

## 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成果，因其对当代人记忆中的历史所进行的颠覆性描述和阐释而备受世人关注，甚至学术著作也能成为畅销书。不仅如此，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也是层出不穷，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这里重点介绍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关注和参与较多的学术成果。

### 1. 关于冷战起源和结束的讨论持续不断

冷战结束的最初几年，美国学术专著、报刊杂志甚至国家领导人经常讨论的话题就是冷战的起源，人们似乎又回到了传统派的观点，认为苏联应对冷战的出现承担责任。至于冷战的结束，则是美国和西方所取得的胜利。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最著名的冷战史专家盖迪斯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历史》。作者是以胜利者的心态和姿态重新审视冷战历史的，认为冷战的形成都是共产主义的错误，而冷战的结束则是西方领导人——特别是像里根、撒切尔这样强硬派和保守派领导人正确决策的结果。<sup>①</sup>盖迪斯的著作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在中国也颇有影响。不过，冷战史研究学者中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学者对他提出批评，如把冷战的责任完全推给斯大林有失偏颇；把冷战的结束看成是正义战胜邪恶则忽视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不道德和违背法律的现象；认为70年代美苏缓和只是维持战后的均势就低估了西欧国家的重要性；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如何影响冷战的进程缺乏关注和认识等。<sup>②</sup>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9·11”

<sup>①</sup> John Gaddis, *We Now Know*. 关于这种看法还有一部比较典型的著作：Norman Friedman, *The Fifty Year War: Conflict and Strategy in the Cold War*, London: Chatham Publishing, 2000.

<sup>②</sup> Carolyn Eisenberg, "Review of *We Now Know* by John L. Gaddi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4, No. 4, March 1998, pp. 1462-64; David Painter, "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old War History*, Vol. 6, No. 4, November 2006, pp. 527-34; Geir Lundestad, "The Cold War According to John Lewis Gaddis", *Cold War History*, Vol. 6, No. 4, November 2006, pp. 535-42.